

STUDY ON THE ETHICAL VALUE AND CHARACTERS DIALOGUE OF ABDULLA QODIRIY'S NOVEL "MEHROBDAN CHAYON" IN UZBEKISTAN

论乌兹别克斯坦阿卜杜拉·卡迪里长篇小说《祭坛之蝎》
的伦理价值与人物对话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452-462>

郭茂全 (*Guo Maoquan*)

文学博士，教授

兰州大学

guomoquan@126.com

摘要：阿卜杜拉·卡迪里是 20 世纪乌兹别克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饱含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阿卜杜拉·卡迪里的长篇小说《祭坛之蝎》叙述安瓦尔与拉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中亚古代浩罕国的社会历史风貌。小说中的爱情婚姻、友谊伦理、国家伦理思想，体现了作家的人民立场。《祭坛之蝎》在人物性格塑造与人物对话艺术方面深具特色，人物性格鲜明，对话符合人物性格特点并不断推动情节发展，充分体现出乌兹别克斯坦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特点。

关键词：阿卜杜拉·卡迪里；长篇小说；《祭坛之蝎》；伦理价值；人物对话；叙事特点

引言

阿卜杜拉·卡迪里 (Abdulla Qodiriy, 1894—1938)，是 20 世纪乌兹别克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版有戏剧《不幸的未婚夫》（1915），诗歌《我们的国家》《致人民》《婚礼》（1914—1915）等，以及中篇小说《好色之徒》、长篇小说《往昔》（1926）和《祭坛之蝎》（1928）等。阿卜杜拉·卡迪里的作品深刻批判暴力统治者，深切同情劳动人民，并热切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体现出自觉的人民立场与深切的人文关怀。

阿卜杜拉·卡迪里的长篇小说《祭坛之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出版）是乌兹别克斯坦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全方位展现了 19 世纪浩罕汗国末期的生活画卷，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为世界读者了解中亚社会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本文将从伦理价值与人物对话特色两个维度，分析《祭坛之蝎》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

征。

一、故事情节与思想内蕴

(一) 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

曲折动人的情节与深厚浓烈的情感是优秀小说的价值坐标，也是作品经典性的构成要素。长篇小说《祭坛之蝎》叙述了一个发生在 19 世纪中亚的浩罕汗国末期的青年男女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英俊博学的米尔扎·安瓦尔与美丽纯真的拉诺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两人心心相印。安瓦尔在王宫里担任文书员，原来的文书长逝世后，博识多才的安瓦尔被提拔为宫廷文书长，因安瓦尔年轻而身居高位，这引来一些妒贤忌能者的怨恨与忌妒。用心险恶的阿布杜拉赫曼、觊觎文书长职位的沙霍达特、伪善放浪的宫廷诗人马赫德等人相互勾结，不断制造事端，构陷安瓦尔。

为破坏安瓦尔的婚姻，阿布杜拉赫曼指使专为可汗物色美女的古尔珊，将拉诺的美貌告知好色、残暴而专制的胡德亚尔可汗。胡德亚尔可汗便向好利贪财的拉诺父亲马赫杜姆求婚，吝啬、贪财、势利的马赫杜姆见利忘义，也迫于威权，不顾养子安瓦尔与女儿拉诺反对，竟然同意了可汗的求婚。

拉诺不满父亲马赫杜姆改变对安瓦尔的承诺，通过书中藏信的方式与安瓦尔传递消息，共同守护着纯真美好的爱情。在婚礼举行的前两天，他们在织布工萨法尔、文书员苏丹纳利等朋友们的帮助下，勇敢的拉诺逃离了自己的家，躲藏到萨法尔姐姐的家里。安瓦尔的挚友苏丹纳利假装向可汗“告发”安瓦尔的出逃，并接替了文书长的工作，既可帮助安瓦尔出逃，又避免让恶人夺取文书长位置的计谋得逞。可恶、狡猾的阿布杜拉赫曼将此事报告胡德亚尔可汗，苏丹纳利被抓入监牢。安瓦尔不忍好友苏丹纳利为自己而受难，便向胡德亚尔可汗自首，并要求放走苏丹纳利，自己甘愿走向刑场。在行刑前，安瓦尔被萨法尔等人救下，乘乱逃走。

在情节安排上，《祭坛之蝎》以作家鲜明的爱情立场、善恶对立的人物矛盾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结局，线索清晰，情节跌宕，富有叙事魅力。

(二) 丰富深刻的思想内蕴

《祭坛之蝎》通过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反映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品批判古浩罕汗国德亚尔统治时期如“祭坛”般政治的专制、腐化与堕落，批判如“祭坛之蝎”的官僚们的奸诈、愚昧、自私，歌颂人民奋起反抗的智慧、勇敢，赞美人世间纯真、美好的爱情，赞美底层民众之间忠诚、团结的友谊。

无论诗歌创作还是小说创作，卡迪里的创作立场都深具人民性。卡迪里

在写作中反对暴政，渴望百姓生活安宁幸福，其人民立场通过对君权与民权、民生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书写体现出来。在《祭坛之蝎》中，国家在可汗的眼里不是为民谋幸福的地方，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权夺利的场所。“胡德亚尔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利，草菅人命，他的刀刃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1:117] 可汗一旦掌王权，就会历史教训，变成新的专制者，亲小人而远贤臣，爱美色而忘民生。“胡德亚尔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折腾了数年，将费尔干纳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1:118]卡迪里的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与其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深入的了解。邸小霞在《祭坛之蝎》“译后记”中指出了卡迪里的人生经验对其创作立场的影响。“作家自小热爱劳动，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深刻体验与感知生活的变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深的同情。对家乡故土的热爱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始终贯穿于他的生命及作品中。”[1: 296] 可以说，热爱故土、同情劳动人民、关注民生疾苦、追求自由幸福是卡迪里创作的价值追求。

经典的世界文学作家都具有人民性创作立场。从创作经历而言，1915 年-1917 年，卡迪里在伊斯兰经学院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后来掌握并精通俄语。1923 年-1925 年，卡迪里在莫斯科布留索夫文学院学习文学，熟读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对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的研习是卡迪里创作人民性立场的重要思想资源。人民立场是前辈作家留给后世作家的宝贵思想财富，卡迪里于 1926 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往昔》[2]。1928 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祭坛之蝎》，这两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卡迪里的文学史地位。1920 年代的苏联社会下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尽管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过去相比并不太高，但民主主义思想依然是其思想主流。“身处重大社会转折和自身转型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未能获得与其知识水平和工作贡献相应的地位，普遍处于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和经济状况欠佳的境地。除去少数著名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能够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特殊扶助之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3]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使作家更倾向于从底层人民的视角看待苦难与幸福。在 1920 年代，知识分子对正义、自由的期盼成为社会的主流，对女性解放的思潮日趋强烈，因此，作家在创作中则表现出男女青年对包办婚姻、父权制以及阶级壁垒的反对，也折射出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二、爱情与友谊的伦理价值建构

爱情与友谊是文学的重要母题，对二者的书写往往反映出作家的爱情观与友谊观，进而体现其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作者创作作品，或是读者阅读作品，或是批评家批评作品，都会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众多的文学道德问题，需要运用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对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4:100]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阿卜杜拉·卡迪里的作品有自觉的伦理观念，他主张自由纯真的爱情理想与忠诚担当的友谊理想，《祭坛之蝎》无疑是窥视作家爱情观与友谊观的最好文本。

（一）爱情观的伦理建构

《祭坛之蝎》爱情观主要体现在安瓦尔与拉诺的爱情故事叙事。在《祭坛之蝎》的扉页，就是安瓦尔与拉诺分别写给对方的“定情诗”。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就是深挚的爱情。安瓦尔写给拉诺的诗句是：“我骄傲，拉诺，你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拉诺写给的安瓦尔诗句是：“我骄傲，米尔扎，你的智慧像远方的太阳闪耀着光芒。”这无疑是男女之间相互欣赏、倾慕的爱情誓言。上述“定情诗”也是“定场诗”，作品的主导化身就是对纯真爱情的赞美。

拉诺是一名勇敢追求、坚贞守护自己爱情理想的女性。在小说的第一节“拉诺未来的主人”中，小说就交待了拉诺对安瓦尔的深切爱恋。爱情就是“生命之光”。“因为拉诺很清楚她未来的丈夫是谁，而且期待嫁给他，所以她的眼神中既没有焦虑，也没有尴尬，而是充满了喜悦。”[1:3]当拉诺知道安瓦尔将成为文书长时，深深理解安瓦尔面临的巨大难题，默默地支持安瓦尔的选择。

安瓦尔对拉诺的爱也同样深沉。“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相同。对安瓦尔来说，幸福就是自己对拉诺的爱情。”[1:104]为了守护爱情，他甘愿忍受养父马赫杜姆对他的冷眼；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他宁可放弃担任王宫文书长的机会，也不愿失去热恋之人。“真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的结合。但事实并非如此：真爱将在分享中经受考验。爱人的结合扑灭了爱火，而分离却使爱火熊熊燃烧，使感情臻于完美。”[1: 228-229]只有相爱的两人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真爱能够经受各种考验。《祭坛之蝎》中有许多篇幅就写安瓦尔与拉诺爱恋过程，这也是小说中最有感染力的故事情节。

《祭坛之蝎》故事情节与人物类型与长篇小说《往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以青年男女爱情的发生发展作为叙事的主线。如果说《往昔》是爱情婚姻悲剧，那么《祭坛之蝎》属于爱情正剧，高度赞扬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爱情的追求。《往昔》中男女青年恋爱中对父母之命的屈从导致最终的悲

剧，《祭坛之蝎》中的青年男女敢于反对父母之命，敢于反抗可汗的专制残暴，最终捍卫自己的爱情。“当卡迪里在创作《祭坛之蝎》时，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们要求摘下面纱，结束自己深居简出的生活，投身到公共生活之中。《祭坛之蝎》小说的创作刚好契合了时代主题，从而散发出耀眼而优雅的光芒。”[1:297]卡迪里对女性最终获得争取幸福的胜利的“结局安排”与他创作时的时代风潮有关。

（二）友谊观的伦理建构

“友爱”是人类的一种“德性”，也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因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4:249]优秀的作品是对包括友爱在内的人性美德的赞扬。“好人之间的友爱是真正的友爱。”[5:259]《祭坛之蝎》吟唱着爱情的赞歌，也奏响了“好人之间的友爱”的赞歌。友谊书写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安瓦尔与纳西姆、苏丹纳利、萨法尔的友谊交往故事中。

纳西姆是安瓦尔少年时的好友，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汗国文书长穆罕默德·拉贾别克的儿子。“两人敞开心扉，心意相通。”[1:52]十五岁的纳西姆因患天花而夭折，安瓦尔万分悲痛，比纳西姆的父母流的泪还多，整整三天，他坐在纳西姆的坟前哭了好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诗来纪念纳西姆，在追思之夜的三周时间里，他坚持为逝者诵读《古兰经》。“安瓦尔炽热的感情和对友谊的忠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1: 53]安瓦尔对友谊的珍惜可见一斑，穆罕默德·拉贾别克看到后，便决定像慈父一样关心安瓦尔。

安瓦尔与苏丹纳利的友谊书写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丹纳利既与安瓦尔是同事关系，也是挚友关系。在安瓦尔的心时，苏丹纳利是他的“大哥”。苏丹纳利看重安瓦尔的品德与才能，主动推荐安瓦尔担任宫廷文书长，并在工作中时时帮助安瓦尔。为了能让安瓦尔顺利逃走，他宁愿冒告假密。事情败露后，他因保护朋友而被捕入狱。“这个忠诚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为安瓦尔献出生命。”[1:266]“苏丹纳利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情况如何凶险、不论将遭受多大的不幸，都将竭力保护自己的朋友，坚定不移。”[1:267]友谊的忠诚体现在安瓦尔与苏丹纳利的身上，可谓是忠诚友谊的化身。

小说叙事就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建构过程。相较于对爱情与友谊的集中刻画，小说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则显得较为“松散”。在人物关系网络中，萨利赫·马赫杜姆一家，马赫杜姆与安瓦尔“养父养子”的关系。马赫杜姆对待女儿拉诺非常严厉，“别说给你空绸缎，就是给你穿厚棉布做的裙子我都舍不得”[1:1]。他也不尊重女儿拉诺的爱情选择，一心想攀附可汗，以获取财富。

妻子尼戈尔·哈努姆不满意丈夫的马赫杜姆势利吝啬，“对他的训话置若罔闻”[1:2]。“松散”的家庭伦理既是人物性格差异导致的，也成为拉诺与安瓦尔“离家出逃”的家庭因素。

三、人物性格塑造与人物对话描写的特点

(一) 人物性格塑造的特点

小说魅力在于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系列，作家在《祭坛之蝎》中为不同的人物画像。《祭坛之蝎》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是有可汗，也有大臣、妃子、宫女、织布工，还有清真寺的神职人员；有不同家庭中的父母、子女、还有邻居、村民等等。

小说《祭坛之蝎》以介绍萨利赫·马赫杜姆家庭作为开篇。萨利赫·马赫杜姆虽出身于最高神职人员家庭，后来宫廷政权变化，其家道中落，祖先的荣耀并没有传到他马赫杜姆身上，留给他的只有一幢房子。马赫杜姆的父亲去世时，马赫杜姆已经二十岁，在穆斯林学校读书，而他的哥哥带着一家人搬到马尔吉兰，并当上了那里的伊玛目。但马赫杜姆与母亲、妹妹留在了浩罕汗国，没有任何收入，穷困潦倒，他便放弃了学业去找工作，并在邻居的建议下办了一所学校，从附近的街区招收十几个学生，勉强养家糊口，并以“相互求亲”的方式娶妻成家。在马赫杜姆三十岁的时候，他的学校有了名气，招收的学生达到一百人。马赫杜姆四十岁时，成为街区清真寺的伊玛目，学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前的学生成了手工业者、商人和穆斯林学院的学生。小说中设有专节“萨利赫·马赫杜姆的某些性格特征”，为其性格“画像”，重点指出尽管马赫杜姆通过开办学校赚了很多钱，收入丰厚，但自私、贪婪、嫉妒，就是一个“吝啬鬼”[1:4]。他又高又瘦，皮肤白皙，留着小胡子。过去七年时，他一直穿着同一件长袍，这件长袍被邻居们戏称为“财富的猪手”，总是穿同一条裤子和一双轻便的皮制套鞋。“马赫杜姆费尽心机让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翻倍。他活着不是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是为了积累财富，为了增加自己的财产。”[1:17] 马赫杜姆对自己吝啬，对家人、学生也很吝啬，在家人在衣着、饮食上要求节制，经常购买最便宜的蔬菜，连学生送的衣服也不给家人穿。他的母亲无法忍受他的吝啬，便到马尔吉兰与长子一起生活；他对学生训斥但不打，并希望学生按时缴纳各类学费，憎恨、怨恨开设学校的竞争者，千方百计吸纳上层人士的孩子在他的学校学习。尽管马赫杜姆有许多缺点，但作为一名老师，他是“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安瓦尔。[1:15] 小说从外貌、行动、语言等方面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吝啬鬼”形象，是一个曾经的贫穷与现在的富足“异化”的“教师”

形象，也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市侩”形象。马赫杜姆了账是一个专制的“养父”形象。他听到安瓦尔拒绝当文书长时，并不考虑官居高位的风险，反而批评安瓦尔“固执而愚蠢”，并以“老师”与“父亲”的名义让他服从。在对待安瓦尔与拉诺的婚姻问题上，他不急于为安瓦尔与拉诺举行婚礼，目的是想更长时间从安瓦尔那里捞钱，时常在安瓦尔不知情时偷偷地收那些让安瓦尔写请愿书的人的钱，将此作为他的“新行当”。

尼戈尔·哈努姆是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妻子，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善良顺从、顽强坚韧的家庭妇女。她在帮助马赫杜姆办学的过程中也是一名教师，尽管有一些收入，但都交给了丈夫。尼戈尔·哈努姆的婚姻并不幸福，“被吝啬的丈夫折磨了二十五年”，“虽然丈夫富有了，但他的吝啬使她流了很多眼泪”[1:17]。“她没有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每花一分钱都得向丈夫交待。”[1:18]尼戈尔·哈努姆的性格与命运是许多中亚老一辈妇女的缩影。

拉诺是一位淳朴美丽的女孩，十七岁的她，圆润的面庞像一朵淡黄色的蔷薇花，头发是蓝黑色的，有浓密的睫毛与精致的鼻子，脸上有小酒窝，笑起来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她的美不仅在浩罕的歌谣中被传颂，甚至整个费尔干纳地区她都是一位值得称颂的美人。”[1:20]她不仅容颜美还心灵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敏锐，性格温婉而善良，通情达理，举止端庄。她在父亲美丽多才的拉诺与贪婪吝啬的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张力，也体现出“从自然是慷慨的”[1:20]。拉诺十四岁就完成了小学课程，学习圣书《哈弗》《古兰经》，文学方面阅读了乌兹别克斯坦作家纳沃伊的所有作品、费祖里的《抒情诗集》以及阿米里、法兹利的作品，还阅读过波斯语书籍，学习书法与语法以及阿拉伯语。她还会写诗，自己编纂了一本她最喜欢的乌兹别克诗人的诗集。她的知识不仅来自于父亲的教授内容，还来自于她广泛的阅读，她的见识超越了普通的同年龄段的女性，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为自己与安瓦尔的婚姻幸福而勇敢斗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智慧。拉诺是一位敢于追求自由爱情与幸福婚姻的知识女性形象，也是卡迪里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

安瓦尔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一名染色工，母亲承担了家庭重担，厄运频频降临，安瓦尔的父母先后离世，只好依靠出嫁的姐姐娜迪拉一家生活。为了摆脱染色工的命运，姐姐把他送到马赫杜姆办的宗教学校。安瓦尔在学习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十一岁时就掌握了读写能力。然而，因生活贫困，娜迪拉的丈夫不再愿供养安瓦尔，在姐姐的苦苦哀求下，孤儿安瓦尔被马赫杜姆收养。安瓦尔十三岁时完成了学业，开始担任学校的助教。

十五岁的他已经可以在学校独立授课。安瓦尔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敏感，并同情不幸的人们。后在穆罕默德·拉贾别克的推荐下，安瓦尔王宫工作，并找人给安瓦尔教授数学知识与撰写宫廷文书。一年间后，安瓦尔就学会了数学，也掌握了起草文书的规则。长大后的安瓦尔不仅品德高尚、公正无私，还才华横溢、博学聪慧。他熟知国家法典，近十年的文书员工作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从不迷恋高官位。因为他对朝臣之间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有深切感受，担心一旦担任文书长会受到奸臣的构陷，也就成了可汗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安瓦尔不仅拥有一颗仁爱之心，更有一颗坚毅勇敢之心。”[1:222] 安瓦尔是一个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寄寓着小说家卡迪里政治理想。

小说中，清真寺伊阿目阿布杜拉赫曼的父亲虽然出身于神职家庭，家人本来送他到其伯父担任教长的布哈拉经学院进修，目的想把他培养为学者，没想到他与经常与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及一帮商人鬼混，彻底堕落腐化了，在冒险家与吸毒者中寻求乐趣。“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放荡者，一个卑鄙龌龊的恶棍，一个纵情享乐的人。”[1:75] 阿布杜拉赫曼的命运是变化的，他在经历过青年时期的萎靡不振后，决心不再做荒唐事，并想通过读圣书改变命运，他的伯父最终原谅了他并帮助他在宗教学校完成学业。他从布哈拉返回浩罕后，几经努力，当上了清真寺的伊玛目。他倾慕拉诺的美貌，曾向她的父亲求婚。得知拉诺已与安瓦尔订婚，便对安瓦尔心生妒恨，自认为自己毕业于正式的宗教学校却无法在宫任职，相反，安瓦尔出身寒门，然而却在宫里任文书员，因此愤愤不平，怀恨在心。他后来通过布道宣传成为一位富人的女婿，逐渐结交经学院教长及其他重要人物，并希望接触到王宫贵族。阿布杜拉赫曼通过安瓦尔获得了宫廷文书员的职位，但并没有感恩瓦尔，而是与沙霍达特串通一起，故意破坏安瓦尔与拉诺的婚姻。

其他人物还有爱搬弄是非的大脖子萨玛德、清真寺宣礼员舒古尔、心胸狭隘的宫廷文书员穆夫提·沙霍达特与米尔扎·卡隆沙赫、伪善的诗人马德赫、趋炎附势的收税员沙希德别克等，这些人物身上都有虚伪、奸诈等“人性之恶”，都属于“祭坛之蝎”。“安瓦尔从这些高贵的祝贺者的脸上读出虚伪、贪婪和魔鬼般的狡猾。只有在穷人那里，安瓦尔才感受到纯朴的善意。”[1:92] 卡迪里通过人物视角展现了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如王后奥卡治·阿依姆、宠妃萝西亚·阿依姆、侍女娜济克、库姆丽、侍从丑角达夫利亚特等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卡迪里对人物“画像”中，既有对某一人物的集中画像，如“萨利赫·马赫杜

姆的某此性格特征”“尼戈尔·哈努姆”“拉诺”“奥卡治·阿依姆”“娜济克”等章节，重点描绘一个人物，又通过不同场景中的对话、行动等展示多个人物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的成长环境呈现出贫穷与高贵、忠诚与背叛的“错位并置”与“辩证统一”。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常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成长特点，如拉诺父亲的贪婪并没有使得拉诺变成刻薄无情，却保留了人性中的美好与光辉，安瓦尔童年少年时代的贫穷并没有让他丧失气节，只知追求财富；相反，反而人物则是恶行与恶境的“共谋者”。阿布杜拉赫曼的堕落则与其当时布哈拉的环境“与之俱黑”，伪善放荡的诗人马德赫的品行与宫廷的整体腐朽紧密相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伦理评判体现出作家对人物与环境关系的辩证解析。

卡迪里对人物的善恶伦理评判受到乌兹别克族文学传统的影响。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的 300 多年中，乌兹别克民族先后建立过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乌兹别克民族有丰富的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古代乌兹别克人的文学形式主要是口头文学，其内容分为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宗教文学大多具有劝喻性，叫人弃恶从善，禁欲宽容。古代乌兹别克宗教文学颂扬慷慨、谦虚、正直、宽容、忍耐等美德，鞭挞人类吝啬、骄傲、伪善等行为。^[6:27] 卡迪里在伊斯兰经学院学习，接触过大量的宗教文学作品，受其影响。其小说创作中自觉强调文学作品的伦理教诲作用。

（二）人物对话描写的特点

在艺术方面，《祭坛之蝎》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鲜明，对话生动，充满了对话叙事的艺术魅力。除了概述人物性格或侧面表现人物形象，卡迪里特别重视通过不同场所空间的人物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作品主题。

特点之一是小说人物对话成为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展示的重要手段。例如，小说“清真寺内的争吵”一节中，阿布杜拉赫曼、萨玛德、舒古尔的对话个性化与戏剧性，将三个“小人”的丑恶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也通过萨尔德的插言体现了安瓦尔的“君子”品格。人物“争吵”式对话既引出了阿布杜拉赫曼“不光彩过去”，又引出了他胸中的妒忌之火，成为后续成为安瓦尔遭到构陷的主要推手，激化情节矛盾，也故事向前发展。小说中“娜济克”全部由宫女们对话构成，分别宫女的不幸命运。

特点之二是小说人物的对话中体现着伦理命题。例如，拉诺所面临的做一个孝顺听话的女儿做一个追求爱情幸福的知识女性之间的伦理抉择困境。爱情对话体现个体自由伦理的觉醒，如安瓦尔与拉诺的私密对话，如拉诺称

安瓦尔不为“客人”，而安瓦尔则称拉诺为“亲爱的老师”。两人的对话具有潜台词性，有时表面欲言又止或言不由衷，实则情笃意深。这都体现两对个人幸福、自由意志等现代伦理观念的自觉追求。在商量出逃计划时，两人则巧妙通过书中诗句表明心迹。同样，君臣、师生、同事、朋友、夫妻之间的对话都显示了当时的社会伦理关系。

特点之三是小说人物的对话因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马赫杜姆的孩子们在家里的谈话则充满了童心童趣，多为天真无邪之语。谈话中呈现人物神情态度的变化。当宫廷文书员苏丹纳利来到马赫杜姆的家里想让马赫杜姆说服安瓦尔担任文书长时，两人的对话体现了各自的性格。马赫杜姆一听到苏丹纳利来自宫里，他“立马露出谄媚的笑容”，认为自己是个“可怜的人”，认为安瓦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穷人”；当苏丹纳利称赞安瓦尔的确可以胜任文书长的职位时，马赫杜姆转而以“老师”自居，洋洋得意地说“给予了安瓦尔最多的关心和爱护”[1:25]，前倨而后恭的态度转变非常迅速。在“授职典礼”对话主要发生在宫廷的文书员围绕安瓦尔担任文书长展开，沙霍达特言语间若无其事与内事的愤愤不平的“假设”，卡隆沙赫的充满忌妒的“贺词”[1:82]。

特点之四是人物对话中常常民间智慧。人物对话中时常出现着乌兹别克斯坦的谚语与俗语，如“女人是家里的基石”“如果必须跌倒，也得从高处跌倒”“如果邻居有牲口，我们就会有粪肥”“穷人总是能够惺惺相惜”“万物皆有时”“谦虚受人尊敬，贪婪遭人唾弃”“宁做一个麻利乞丐，也不做一个磨蹭工匠”“无赖在褥垫上养尊处优，而智者只得席地而睡”“生活就像一个集市，每个人对自己的商品赞口不绝”“乌鸦不会啄同类的眼睛”等，为小说人物性格的凸显增色不少。

特点之五是人物对话具有潜台词，这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和深化主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阵营人物对话其实是新旧思想、不同伦理观的交锋，不同的生活空间则是人物展示的舞台，而在人物对话中常常预示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变化。

总之，卡迪里的《祭坛之蝎》通过其高超的人物对话艺术，成功地将宏观的社会伦理困境具象化为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外部的人际冲突。作品既是“丑恶者”的展演，也是“善良者”的颂歌，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生活的伦理价值的批判性反思。

结语

阿卜杜拉·卡迪里《祭坛之蝎》是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经典中的代表性作

品。“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精华，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过去或现在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4:148]《祭坛之蝎》所蕴含的人性思考、爱情理想、友谊观念以及对国家政治伦理的思考，都体现了阿卜杜拉·卡迪里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无论文学经典中的正剧还是文学经典中的悲剧，都让读者不断反思“人应当怎样活的问题，怎样追求自己的幸福”等终极追求。

文学经典蕴含着不朽的道德力量与永恒的伦理价值，我们应不断阅读、阐释经典，从中发掘新的意义。《祭坛之蝎》不仅是乌兹别克民族的文学瑰宝，也为理解全球范围内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社会伦理变迁提供了经典案例。因此，与长篇小说《祭坛之蝎》的对话、解释、传播依然是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的读者、批评者的重要文本。阿卜杜拉·卡迪里《往昔》《祭坛之蝎》等作品中亚文学地图中的重要作品，值得国内外研究者从多种维度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

- [1] (乌兹别克斯坦) 阿卜杜拉·卡迪里.祭坛之蝎[M].邸小霞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 [2] (乌兹别克斯坦) 阿卜杜拉·卡迪里.往昔[M].邸小霞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3] 张建华. 20世纪 20 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J]. 社会科学, 2010(10): 115-125.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6]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亚民间文学[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